

鲁西奇/著

城墙内外

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

中华书局

鲁西奇/著

城墙内外

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墙内外: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/鲁西奇著. -北京:中华书局,2011.1
ISBN 978-7-101-07639-4

I. 城… II. 鲁… III. 汉水-流域-城市史-研究
IV. K2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9421 号

书 名	城墙内外: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
著 者	鲁西奇
责任编辑	王 芳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http://www.zhbc.com.cn 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	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9 $\frac{3}{4}$ 插页 2 字数 470 千字
印 数	1-2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101-07639-4
定 价	76.00 元

目 录

《水经注》所见汉水流域的城邑聚落及其形态	1
一、问题之提出：六朝时期南方地区的聚落形态	1
二、《水经注》所见汉水上游地区的聚落形态	8
（一）《水经注》所见汉水上游城邑戍堡考述	9
（二）3—6 世纪汉水上游地区的聚落形态：以“城居” 为主	43
三、《水经注》所见汉水中下游地区的城邑聚落	47
（一）《水经注·沔水中》所见汉水中下游城邑聚 落考	47
（二）聚居与散居：著籍户口与非著籍户口的居住 方式	73
四、《水经注》所见南阳地区的城邑聚落及其形态	81
（一）《水经注》卷三一《淯水》所见城邑聚落	81

(二)《水经注》卷二九《比水》所见城邑聚落	100
(三)《水经注》卷二九《湍水》所见城邑聚落	108
(四)《水经注》卷二〇《丹水》所见城邑聚落	112
(五)汉魏六朝间南阳地区的聚落形态及其变化	118
五、讨论:汉魏六朝时期聚落形态的差异及其演变	128
(一)日本学者的论点:从“城居”向“村居”演化	128
(二)两汉时期汉水流域乃至长江中游地区 的聚落当以规模较小的散村为主	131
(三)东晋南朝时期长江中游地区“民”与“蛮”在聚落 形态上的差异:“华夏居城郭,夷蛮居山谷”	140
唐宋时期汉水流域州县城的形态与空间结构	149
一、引言:唐代地方城市中是否普遍存在封闭式的 里坊制?	149
二、唐宋时期汉水流域州(府)城考	158
三、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的县城考述	218
四、结语与讨论	251
(一)本文所用资料与研究方法之检讨	251
(二)城郭之有无、沿用与新筑	256
(三)罗城之兴筑、拓展与里坊制的推行及其实质	267
(四)城下街区的出现与“市”的位置	274
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府、州、厅、县城的形态与空间结构	279
一、引言:城墙内的城市?	279
二、城墙内外: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府、州、县城的 形态与结构	292

(一)三个府城:安陆(承天)、汉阳与德安	293
(二)三个州城:荆门、沔阳与随州	316
(三)六个县城:京山、天门、潜江、汉川、应城、云梦	333
(四)讨论:平原地区府、州、县城的规模、 形态与空间分划	355
三、山城及其河街:明清时期汉水上游部分府、州、 厅、县城的形态与空间结构	366
(一)两座府城:鄖阳府、兴安府	366
(二)十一座县城:房县、竹山、竹溪、保康、鄖西、 上津、平利、洵阳、白河、石泉、紫阳	377
(三)两座厅城:汉阴厅、砖坪厅	402
(四)讨论:山区治所城市的规模、形态与空间结构	405
四、“双子城”:明清时期襄阳府城—樊城镇与 光化县城—老河口镇的空间结构	413
(一)襄阳府城与樊城镇	414
(二)光化县城与老河口镇	427
(三)复式城市的形成及其意义	434
五、结语与讨论	437
(一)本文所用资料与研究方法之检讨	437
(二)明清时期地方城市形态演化的两个方向	440
(三)城墙:威权的象征	443
(四)城墙内外:城市的空间分划及其意义	445
主要征引文献	449
后 记	463

图表目录

图 1 《水经注》所见汉水上游地区城邑戍堡的分布	43
图 2 《水经注·沔水中》所见汉水中下游地区城邑聚落的分布	73
图 3 《水经注》所见南阳地区城邑聚落的分布	124
图 4 汉中城址变迁示意图	164
图 5 唐代襄州城内外里坊示意图	188
图 6 南宋郢州城示意图	206
图 7 唐宋真符、黄金县故址示意图	225
图 8 唐宋时期汉水流域州县治所城市的分布	250
图 9 民国时期安陆(钟祥)城图	297
图 10 清中期安陆府城复原图	299
图 11 清前期汉阳府城图	304
图 12 清末汉阳府城内外图	310
图 13 清代中期德安府城图	316
图 14 民国荆门县城图	320
图 15 清中期沔阳州城图	326
图 16 清后期随州城复原图	332
图 17 民国京山县城图	337
图 18 清中期天门县城复原图	341
图 19 清前期潜江县城复原图	347
图 20 民国时期应城图	352
图 21 民国时期云梦县城图	354
图 22 清中后期郢阳府城图	371

图 23	清后期兴安府城复原图	376
图 24	清后期竹山县城复原图	383
图 25	清后期平利县城复原图	396
图 26	清中后期汉阴厅城复原图	403
图 27	明中后期襄阳府城复原图	418
图 28	民国时期襄阳—樊城街道图	422
图 29	明后期光化新城—旧城示意图	430
图 30	清末老河口镇复原图	433
表 1	刘宋中期秦州所属部分侨郡县的著籍户口数	16
表 2	《水经注》所见汉水上游流民聚居的城邑堡聚	44
表 3	《水经注·沔水》所见汉水上游地区的军事性城垒戍堡	45
表 4	《水经注·沔水中》所见汉水中下游地区的城邑聚落	76
表 5	《宋书·州郡志》所记汉水中下游地区部分郡县的著籍户口	79
表 6	《水经注》所见南阳地区的“故城”	119
表 7	《水经注》所见南阳地区的乡、聚、亭、城、戍	123
表 8	《宋书·州郡志》所记南阳各郡的著籍户口	126
表 9	马王堆帛书《驻军图》所见聚落户口状况	134
表 10	《嘉禾吏民田家莧》所见长沙地区自然聚落的规模	137
表 11	唐宋时期汉水流域州(府)县城郭概况	259
表 12	清中期沔阳州城内外的里社	327
表 13	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府、州、县城的等级与规模	357
表 14	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府、州、县城的内外街道情况	362
表 15	明清时期汉水上游部分治所城市的规模与形制	406
表 16	明清时期汉水上游地区部分府厅县城城内外街区情况	410
表 17	清代襄阳城内坊街情况	421

《水经注》所见汉水流域的 城邑聚落及其形态

一、问题之提出：六朝时期南方地区的聚落形态

陈寅恪先生《桃花源记旁证》起首即谓：

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，当时中原避难之人民，其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，东北则托庇于慕容之政权，西北则归依于张轨之领域，南奔则侨寄于孙吴之故壤。不独前燕、前凉及东晋之建国中兴与此中原之流民有关，即后来南北朝之士族亦承其系统者也。……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，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，屯聚坞堡，据险自守，以避戎狄寇盗之难。

陈先生并引据史乘，以明其说。他首引《晋书》卷八八《孝友·庾袞传》所记：

张泓等肆掠于阳翟，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。是时百姓安宁，未知战守之事。袞曰：“孔子云：‘不教而战，是谓弃之。’”乃集诸群士而谋之曰：“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，将以安保亲尊，全妻孥也。古人有

言:‘千人聚,而不以一人为主,不散则乱矣。’将若之何?”众曰:“善。今日之主,非君而谁!”……于是峻险阨,杜蹊径,修壁坞,树藩障,考功庸,计丈尺,均劳逸,通有无,缮完器备,量力任能,物应其宜,使邑推其长,里推其贤,而身率之。……及贼至,袞乃勒部曲,整行伍,皆持满而勿发。贼挑战,晏然不动,且辞焉。贼服其慎而畏其整,是以皆退,如是者三。

此段叙述,诚为一乱世自保图(陈先生并引《郡斋读书志》,谓确有《庾袞保聚图》一卷),其坞堡之创置、组织与战守均于此可见。其中特别值得注意者,乃是“邑推其长,里推其贤”,“邑”当即县邑,“里”即乡里之里,则于此坞堡之中,得聚诸县邑乡里之人,其组织则一仍县邑、乡里之制,而庾袞则俨然如郡守。

陈先生又引《晋书》卷一〇〇《苏峻传》:

永嘉之乱,百姓流亡,所在屯聚。峻纠合得数千家,结垒于本县(掖县)。于时豪杰所在屯聚,而峻最强。遣长史徐玮宣檄诸屯,示以王化,又收枯骨而葬之。远近感其恩义,推峻为主。遂射猎于海边青山中。

其时苏峻周围诸豪并立,峻以势力最强而得居其长,则苏峻所屯之垒当最为强大,周围则棋布众多大小屯垒。

陈先生又引《晋书》卷六二《祖逖传》:

初,北中郎将刘演距于石勒也,流人坞主张平、樊雅等在谯,演署平为豫州刺史,雅为谯郡太守。又有董瞻、于武、谢浮等十余部,众各数百,皆统属平。……而张平余众助雅攻逖。蓬陂坞主陈川,自号宁朔将军、陈留太守。逖遣使求救于川,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,逖遂克谯城。……(桓)宣遂留,助逖讨诸屯坞未附者。……河上堡固,先有任子在胡者,皆听两属,时遣游军伪抄之,明其未附。诸坞主感戴,胡中有异谋,辄密以闻。前后克获,亦由此也。

诸堡之攻战兼并、弱肉强食之法则于此毕现。

这些坞堡,多据山凭险,以保聚为务,而脱离于直接生产区域,故多借掳掠为生存手段之一,诸坞堡间乃多争战杀伐。陈先生说:

要之,西晋末世中原人民之不能远徙者亦借此类小障库城以避难逃死而已。但当时所谓坞垒者甚多,如祖逖传所载,固亦有在平地者。至如郗鉴之避难于峯山,既曰“山有重险”,又曰“保固一山”,则必居山势险峻之区、人迹难通之地无疑,盖非此不足以阻胡马之陵轶、盗贼之寇抄也。凡聚众据险者因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给之故,必择险阻而又可以耕种及有水泉之地。其具备此二者之地必为山顶平原,及溪涧水源之地,此又自然之理也。^①

据此,则知晋末以来,或可上溯至东汉末年,北方地区之乡村聚落形态发生了一大变化:相当部分的民众为了逃避战乱(“胡马之陵轶、盗贼之寇抄”),离开原先居住的村落,选择有险阻可凭、水源可用、复有平田可耕之处建立坞壁堡垒,团聚而居。于是,当时中原地区遂形成这样的人文地理面貌:在广袤的平原或低山丘陵、黄土区域,于山水险要处点缀着大大小小的坞堡,每一个坞堡都拥有大小不等的生存空间,即坞壁—水源—农田区—樵采区以及掳掠区,依次向外推演。较大的坞堡内部分划成不同的乡里乃至郡县,各统以长;而在本坞之外,又拥有若干较小的坞堡为其附属——显然,这些附属坞堡要承担一些义务,以求得大坞主的保护,而此种坞堡间的统属关系,打破了汉代以来的郡县乡里统辖关系,其统属原则也不再是朝廷的法度,而是实力。横行在这些坞堡之间的,就是胡族兵骑。所谓胡族的统治,也就意味着这些坞堡主的降附,接受胡族政权给予的官职,而其坞主的实质则并未变化。两汉以来散居于平原之上、直接接近生产区域的散居村落,如今大都荡然无存;间有幸存者,亦不断沦为胡骑贼寇掳掠之对象。

^① 陈寅恪:《桃花源记旁证》,见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,第168—179页,引文分别见第168、171页。

陈先生以及后来诸先生所论之坞堡,主要指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坞堡^①。唐长孺先生对《桃花源记》所据之“本事”的看法与陈先生不同,认为《桃花源记》所述故事乃是根据武陵蛮族的传说,这种传说恰好反映了蛮族人民的要求。唐先生并指出:“当时的流亡避难集团确实很多建立坞堡,然而坞堡却不一定为流亡避难集团所建。……汉代北方边境到处有这样的建筑,常见的亭隧堡壁都是这类防御物。壇山坞、皇天坞等只能说其地曾建军事防御性的小城,不能断言为避难入山者所筑,或曾保聚之处。”^②唐先生所论,启发我们进一步揣测:建立坞壁堡垒,团聚而居,很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各地普遍采用的居住方式。

首先,不仅如陈先生所论,留在北方未得南徙者大多保聚坞堡,即便是南来之移民,移入江淮汉沔巴蜀者,大抵亦多为集聚而居,虽然并不一定建立坞堡,亦未必保聚山险,但其团聚而居,以集体力量保障安全,而非分散居住,“以就田业”,则可大致肯定。其所居有称为坞者,如《晋书》卷六三《魏该传》:

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,屯宜阳界一泉坞,数为诸贼所抄掠。尹要该共距之,该遣其将马瞻将三百人赴尹。瞻知其无备,夜袭尹杀之,迎该据坞。坞人震惧,并服从之。乃与李矩、郭默相结以距贼。荀藩即以该为武威将军,统城西雍凉人。

此一泉坞盖本为京兆杜氏所营。《三国志》卷一六《魏书·杜畿传附子杜恕

① 汉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的起源、发展、组织、性质,向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,重要的研究成果有:赵克尧:《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》,《历史研究》1980年第6期;刘华祝:《试论两汉豪强地主坞壁》,《历史研究》1985年第5期;金发根:《坞壁溯源及两汉的坞壁》,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37本上册(1967年),第201—220页;黄宽重:《从坞壁到山水寨——地方自卫武力》,见杜正胜主编:《中国文化新论——吾土与吾民》,(台北)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1982年,第227—280页;[日]那波利贞:《坞主考》,《东亚人文学报》第2卷第4期(1943年),第467—535页;[韩]具圣姬:《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》,民族出版社,2004年,特别是其第一章“绪论”部分。

② 唐长孺:《读〈桃花源记旁证〉质疑》,见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》,三联书店,1959年,第163—174页,引文见第163页。

传》引《杜氏新书》谓杜恕于魏正始中(240—248年)以疾去官后,“遂去京师,营宜阳一泉坞,因其垒壅之固,小大家焉”。其子杜预少时或即居于此坞中。盖一泉坞本为杜氏族居之地,故杜尹屯守其地。《水经注》卷一五《洛水》作“一全坞”,谓其“城在川北原上,高二十丈,南北东三箱,天险峭绝,惟筑西面,即为全固,一全之名,起于是矣。刘曜之将攻河南也,晋将军魏该奔于此”。魏该所统雍凉流民人居一泉坞,显然是利用固有坞堡而团聚。而大部分南来流民,则多分建城邑,且“皆取旧壤之名”,是为侨州郡县。侨州郡县治所多筑有城垣堡壁,见诸史乘。如东晋成帝“咸和中,寇难南逼,户口南渡”,因置侨汝南郡,治于涂口。《水经注》卷三五《江水三》记涂水出江州武昌郡武昌县泰山,“西北流迳汝南侨郡故城南”,则知汝南侨郡治立有城垣。又,永嘉初侨置之新蔡郡因汉九江王黥布故城而置,亦当有城垣^①。咸康三年(337年),“以河东人南寓者,于汉武陵郡孱陵县界上明地侨立河东郡,统安邑、闻喜、永安、临汾、弘农、濛、松滋、大戚八县,并寄居焉”^②。《水经注》卷三四《江水二》云:

江水又东,迳上明城北。晋太元中,苻坚之寇荆州也,刺史桓冲徙渡江南,使刘波筑之,移州治此城。其地夷敞,北据大江。

则上明地本无城垣,北人南来后,侨立河东郡;四十年后,荆州刺史桓冲方修筑城垣,并移荆州治于此城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江陵府松滋县“三明故城”条谓:

亦谓桓城,在县西一里。居上明之地,而桓冲所筑,故兼二名。苻坚南侵,冲为荆州刺史,渡江南上明,筑城以御之。上明在县东,因城在渠首,故曰上明。晋朱龄石开三明,引江水以灌稻田,大为百姓兴利。

① 《晋书》卷一五《地理志下》“扬州”后叙谓“元帝渡江……江州又置新蔡郡”。同书卷一四《地理志上》“豫州”后叙复云:“(晋)孝武改蕲春县为蕲阳县,因新蔡县人于汉九江王黥布旧城置南新蔡郡,属南豫州。”所记略有歧异,但新蔡侨郡治于黥布旧城,当无疑问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一四《地理志上》“司州”后叙。

后堤坏,遂废。^①

按:唐松滋县即由晋宋松滋县沿袭而来,上明城在其西一里处,相距甚近。晋宋时松滋等侨县是否建有城垣不详。《宋书》卷三七《州郡志三》荆州刺史“南河东太守”条谓宋初南河东郡领有八县,孝武帝孝建二年(455年),以广威(即“大威”)并闻喜,弘农、临汾并松滋,安邑并永安,故领县四,有户二千四百二十三,口一万四百八十七。《宋书·州郡志》所记户口数,一般认为为大明末(464年)的著籍户口数,其时距这些侨户南来已有百余年。然而,河东侨户南来之初,其户口数必更少,而分属八县,则每县平均或仅有百余户,当不会超过二百户。以百余户之众,经行千余里,流寓于江南潮湿水泽之区,必集聚团结,方能求得生存发展。故成帝时河东诸侨户南来之初,寓居上明地,分置八个侨县,当即八个较大的集居聚落,每一聚落的规模当在百余户至二三百户间^②。

其次,不仅南来北人多为聚居,南方地区原有的土著居民,很可能也多呈现出聚居的倾向。《晋书》卷一二〇《李特载记》记太安二年(303年)罗尚与李特之蜀中交战,“是时蜀人危惧,并结村堡,请命于特,特遣人安抚之。益州从事任明说尚曰:‘特既凶逆,侵暴百姓,又分人散众,在诸村堡,骄怠无

①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“阙卷逸文”卷一,山南道江陵府松滋县“上明故城”条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052—1053页。

②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:“北人南来之路线及其居住地域问题,实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经济史之关键所在。”并对南来北人之居住地域做了阐述,认为:在长江下游地区,“下层阶级大抵分散杂居于吴人势力甚大之地域”,次等士族则集中居住于“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”,上层社会阶级则或“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”,或“渡过钱塘江,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之会稽郡”;在长江中上游地区,南来之上层士族多迁至“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”,次等士族则多南徙至襄阳一带(《述东晋王导之功业》,见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,第48—68页,特别是第57—67页)。谭其骧先生《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》(见所著《长水粹编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272—298页)、胡阿祥《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》(见《历史地理》第八辑,第88—100页;第九辑,第210—227页)等论著均系统地考述了东晋南朝南来北人的分布地域,为我们认识此一问题奠定了基础。然而,此一时期南来北人徙居南方上述地域、建立侨州郡县后,究竟是集聚居住于城堡坞堡或较大集村之中,还是分散成较小的村落甚至单个农户,以尽可能地靠近耕地,则迄无较明晰的认识。

备,是天亡之也。可告诸村,密克期日,内外击之,破之必矣。’尚从之。……明潜说诸村,诸村悉听命。还报尚,尚许如期出军,诸村亦许一时赴会”。则蜀中土著之结堡,是应对流人人蜀之一策;而诸村堡与罗尚大军结盟,合力抵抗李特,正见出村堡实已成为当时蜀中乡村的基本组织。同书同卷《李流载记》复称:“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,城邑皆空。流野无所略,士众饥困。”郡县城壁破坏殆尽,无可保守,遂成空城,民众居于乡野坞堡之中,乃是乱离之常态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九二《居处部》“城上”条引袁山松《宜都记》曰:

限山县有山名下鱼城,四面绝崖,两道可上,皆险。山周回可二十里,上有林木池水,里民种于山下。晋永嘉乱,土人登此避贼,贼守之经年。食鱼掷下与贼,以示不穷,贼遂退散,因以此为下鱼城。^①

假山县在今湖北西南部长阳县境。这里的“里民”、“土人”显然是当地土著居民,其所避之贼则可能是两晋之际流入荆湘的巴蜀流民。里民本于山下耕种,很可能是散居;为避贼而登下鱼城,居之经年,正是以团聚的方式抵御外患。又,《宋书》卷五三《谢方明传》记晋末谢方明为南郡相,尝放江陵县狱囚归家,使过三日还到;有一囚逾期未归,“囚逡巡墟里,不能自归,乡村责让之,率领将送”。这个囚犯逃匿于“墟里”,而终为乡村民众擒送官府,说明江陵地区的墟里应是集中居住的村落。至刘宋初年,方明转任会稽太守。《宋书》本传云:

江东民户殷盛,风俗峻刻,强弱相陵,奸吏蜂起,符书一下,文摄相续。又罪及比伍,动相连坐,一人犯吏,则一村废业,邑里惊扰,狗吠达旦。

则会稽郡似曾实施过伍保之制;又由“一人犯吏,则一村废业,邑里惊扰,狗吠达旦”的描述来看,当时江东地区的村落规模已较大,可能已形成集聚村落;“邑里”之称,则暗示这些村落当有某些防御设施,虽然未必筑有城垣,

① 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九二《居处部》“城上”条,中华书局,1960年,影印本,第929页上、下。

很可能有篱栅、河壕之属。这些集居聚落的规模,《南史》卷五五《罗研传》载梁初罗研答益州刺史萧藻曰:“蜀中积弊,实非一朝。百家为村,不过数家有食,穷迫之人,什有八九,束缚之使,旬有二三。”则知百家是村的平均户数。

上述零星材料,使我们倾向于认为:东晋南朝时期,长江流域的很多地区,无论是南来北人,还是原有土著居民,在居住方式上都表现出一种集聚化趋势,或于山水险阻处筑立城壁坞堡,或借河湖之势置栅浚壕,以保障集居聚落的安全。由于当时北方黄河流域到处都散布着坞壁,因此,似可推论:魏晋南北朝时期,南北方地区的聚落形态均普遍表现为规模较大、四周围以城垣或壕栅等安全防御设施的集居聚落。

然而,上举材料确实非常零散,反映的实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较典型的情况,据此而得出的推论,颇给人以“选精集萃”、“以点概面”之感。显然,欲对六朝时期南方地区聚落形态及其变化提出一个较全面的认识,还需要做出更为全面、系统的考察,需要尽可能地“复原”一个地区的聚落状况。因此,本书即以今本《水经注》所见汉水流域之城邑聚落为主要线索,试图借此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六朝时期汉水流域聚落的分布及其形态^①;然后,以对汉水流域聚落形态的切实认识为基础,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(特别是长江流域)聚落形态的总体面貌及其变化提出一些看法。

二、《水经注》所见汉水上游地区的聚落形态

今本《水经注》之《沔水》篇别为卷二七、二八与二九之上半,其中卷二九之上半所记实为沔水入江之后,亦即江水,兹略而不论。本节主要考述今本

① 上个世纪90年代初,得从先师石泉先生读书。入门之初,先师即令研读《水经注》南方诸水各篇,并教以读书之法:当以王先谦合校本为主,辅之以杨守敬、熊会贞注疏本,参以武英殿之官本;于诸家异说不明处,则当参合今见《永乐大典》本;于注文及诸家疏释所涉及之史实,当溯本求源,翻检史志之记载,如有可能,更与后世之地志所记相比照,以明其源流,见其同异,尤须于常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,发现问题。乃遵从先师之教诲,仔细研读《水经注》之江、沔、湘、资、沅、澧、潯、淮水诸篇,成读书札记若干篇;先移录各篇经注文,于其下简要注出诸家注疏解说之异同,以及自己之疑问;然后于有疑处拾掇相关史事,略加辨析。本篇所使用之基本材料,即为当年所做之读书札记。

《水经注》卷二七及卷二八上半部分所记汉水上游地区诸城邑戍垒,然后就其所反映的汉水上游地区的聚落形态状况略加讨论。

(一)《水经注》所见汉水上游城邑戍堡考述

1. 沮县、沮水戍

《水经注》卷二七《沔水上》经文“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中”句下注文云:

沔水一名沮水……导源南流,泉街水注之。水出河池县,东南流入沮县,会于沔。沔水又东南,迳沮水戍而东南流,注汉,曰沮口。

沮水即汉水北源今之黑水河,泉街水即今之白河;二水在今略阳县东境之黑河店交汇后,继续东南流,在勉县土关铺西与西南来之汉水正源(南源)玉带河相汇。沮县,为汉旧县,《汉书·地理志》武都郡河池县下原注:“泉街水南至沮入汉,行五百二十里。”而此段注文但谓河池水“东南流入沮县”,而不云“迳”,则汉沮县当在泉街水与沮水汇合后之沮水(黑水河)、沮水入汉前之沮水两岸地,即今勉县茶店镇附近。注文不言其为沮水所经,盖其时沮县已废。《华阳国志》卷二《汉中志》武都郡下记有沮县,谓“河池水所出,东狼谷也”。则此河池水当即《汉志》与经文所记之沮水,即今之黑水河,而晋时仍有沮县。《宋书·州郡志》、《南齐书·州郡志》武都郡下并无沮县,也说明宋齐武都郡无沮县。汉晋沮县或即废于晋宋之际。

“沔水又东南”之“沔水”,亦当即沮水(今黑水河);“迳沮水戍而东南流,注汉,曰沮口”,则沮水戍亦在沮水入汉之前,即今茶店南、土关铺北之沮水两岸地。晋孝武帝宁康元年(373年)秋,“梁州刺史杨亮遣其子广袭仇池,与秦梁州刺史杨安战,广兵败,沮水诸戍皆委城奔溃”。胡三省注云:“晋盖阻沮水列戍以备秦。”^①则沮水诸戍均筑有城,或即可称为“戍城”。注文下引庾

^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〇三,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八月壬子,中华书局,1956年,第3264页。《晋书》卷一一三《苻坚载记》所记与此略同。